

类 书 溯 源

洪 湛 侯

类书是汇集古籍中的词语或其他资料，按照类别或韵部编排起来，以供检索的书。

我国的类书起源很早，鸿篇巨制，代有兴作，洵为中华民族绚丽多采的文化史上又一座资源丰富的宝山。无数失传的文献赖以保存，历代的典章制度藉资查考。直到今天对于文献整理、史料辑存以及语言史、文学史、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工作还起着巨大的资料和工具作用。类书的制作虽然源远流长，但对于类书的萌芽和创始，类书产生的原因以及正式见诸史志著录等，今天仍然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上述问题略加论列。

类书产生于六朝，今天的看法都已比较一致。《隋书·经籍志》录有梁刘峻《类苑》一百二十卷和徐勉等的《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以及北齐的《圣寿堂御览》三百六十卷等；此后《南史》载有梁陶宏景的《学苑》一百卷、梁简文帝的《法宝联璧》三百卷，《梁书》也记载张缵的《鸿宝》一百卷。这些书实际上都是类书，但上述史志并未标出类书之名。直至《新唐书·艺文志》始著“类书”之目，是为类书见诸史志之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类书小序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何类可归……”这段话指出了类书编制的特殊性和内容的广泛性。但《提要》将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标为类书之首，把它视为我国的第一部类书，则未免失检。考其致误之由，盖沿用了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误说。其实宋代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艺文承诏撰述》篇就已指出“类事之书，起于《皇览》，”按《三国志·魏志·杨俊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王

象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可见其时代之早和规模之大。梁元帝肖绎在位三年（552—554），撰编《古今同姓名录》在此期间。王象等奉魏文帝曹丕诏撰《皇览》，曹丕在位七年（220—226）。据此推算，是《皇览》当较《古今同姓名录》早三百余年。

类书是工具书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工具书无论辞书、谱录、年鉴、手册大致都可分为综合性的和专科性的两大类。专科性的工具书，产生都比较晚，类书自不例外。《古今同姓名录》已属专科类书，其较《皇览》晚出，自亦符合类书发展的规律。《皇览》开创了我国类书编纂的体例，故历来学者视为“类书的权舆”。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历史上任何一种体裁的著作产生，都必然有其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以及本身内在发展的因素。公元三世纪初年能产生《皇览》这样一种分列四十余部八百余万字的大型类书，决不是偶然的。类书是采辑各种古籍中的有关资料，分类排比，以供查阅的工具书。这也是类书编制上有别于普通书籍的特点。汉代《史记》《汉书》的编撰，在史料整理上建立了分国分朝分类分人系属的方法。特别是司马迁作《史记》，在编年、纪传之外，又将有关学术制度的史料编为“八书”，实际上开启了以类隶事的类书之体。刘向编校中秘书，整理旧籍，汇集有关历史故事，编成《说苑》、《新序》，以类相从，也都具备类书的性质。在文学上，文字华丽辞藻堆砌的辞赋，成为汉代文学上的一种重要体裁。如班固《西都赋》：“鸟则玄鹤白鹭、黄鹄鸛鸛、鸬鹚鸕鹚、鳧鷖鸿雁，朝发河海，夕宿江汉。”就连用了十二个鸟旁字；张衡《南都赋》“其木则桧松楔榎、椶柏柰檀，枫柙櫨櫨，帝女之桑，楫枻栢櫨，桧柘櫨櫨”。

一连用了二十个木旁字。这样重视辞藻，必然要求有广博的见闻和丰富的资料以供临文的需要。文风所向，促使文士必须求助于类书之体。六朝辞赋承汉赋之体而尤有甚焉。逞博衍奇，标新立异，竞相使用奇语难字僻典，形成一代文风。加上当时南方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佛经的传播又大大丰富了辞汇的内容，这些客观因素也都促使类书应运而生。《皇览》以后，到南北朝时期，类书的编纂受到普遍重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一般士大夫阶层，竞相编制，盛极一时。自六朝至清末，据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著录，约有六百余种，大部分已经散佚，今存者约有二百种左右。现有类书以唐代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以及《白孔六帖》最为著名。明代的《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多卷。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可以说是类书中集大成的著作。

从上述这些主要类书的编纂情况看来。封建社会编纂类书的目的和类书产生、发展兴盛的原因，约言之有下列数端。

（一）把修纂类书作为“文治”的一种手段

类书最初的编纂，只是汇集资料以供帝王省览之用，类书正式作为工具书使用，那是唐代以后的事情。例如《皇览》的编制目的，顾名思义就是为帝王服务的。再如北齐祖珽等编纂的《修文殿御览》，初名《玄洲苑御览》，后又改名《圣寿堂御览》，最后才改今名。又如《太平御览》为宋代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6年）李昉等奉敕编撰的。初名《太平编类》宋太宗赵光义誇示自己好学，命令每天进呈三卷“供乙夜之览”，因此改名“太平御览”。再如《册府元龟》一千卷。前五百卷纪君，后五百卷纪臣。册府为藏书之府，元龟即大龟。古人认为龟通神明，取名元龟有“龟鉴”之意。本来宋

真宗赵恒命王钦若 杨亿 修《历代君臣事迹》作为君臣学习借鉴的楷模。编成以后改称《册府元龟》。此书所辑录的材料都出于正经正史，及唐五代的诏令、奏议等文献资料，不言而喻，当时正是作为封建政治教本使用的。上述的《太平御览》、征引古籍多达一千余种，这些书十之七八都已失传，《册府元龟》所引的史书特别是五代史料如诏令奏议等亦大都散佚，《册府元龟》可以用来校史补史，并作为研究隋唐史事者之参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所起的工具作用，乃是后来的事情，当时的编纂目的都未必如此。

唐宋以来，一些大型的官修类书，大都编成于改朝换代、政局初定之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谈到宋代编纂《太平御览》等书时曾指出：“因为在宋初天下统一，国内太平，因招海内名士，厚其廩饩，使他们修书，当时成就了《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封建统治者一方面标榜“偃武修文”点缀昇平，另一方面笼络和控制封建士大夫，以缓和社会矛盾。但在客观上却给我们留下了这一宗文化遗产。

（二）为推行科举制度服务

“科举”为分科举拔人才之意。始于隋文帝杨坚，继承于隋煬帝杨广，唐宋更有所发展。明清制度尤密。唐代科举科目虽多，士人所趋，惟“明经”“进士”科尤重诗赋，专尚文辞，故又称为“辞科”。宋代科举制度，大体因袭唐制。明代开始以“八股文”试士，清代因之，更有所发展。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麻痹人民，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封建士子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趋之若鹜。由于科举试士特重诗赋文辞，这就迫切需要编纂类书提供典故、辞

藻，为临文之助。许多类书就是在这样的功利思想指导下编纂的。宋王应麟编《玉海》二百卷，从天文、律宪、地理到学校、兵捷、祥瑞共二十一门，下分子目，合二百四十余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即为词科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宋唐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在科举所用的类书中，此书价值较大。又如刘达可编撰的《壁水群英待问会见选要》八十卷，专为太学生应试答策之用。苏易简编《文选双字类要》三卷，专选“文选”中的俚语警句，分类纂辑也是为了备科举临文之用。

根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类书计有三百〇七部，《宋史·艺文志补》又列二十四家，两者总计有一万三千多卷。虽包括前代传下来的在内，但总的说来宋代类书已大大超过以前各个朝代。元代类书的编纂一落千丈。据史志统计：元代统治的九十七年中，共编类书二十一家。一千六百余卷，不到宋代类书的十分之一。主要原因是元代蒙古统治者蔑视汉族文化，科举制度消沉，因而类书的编纂上不及唐宋，下不逮明清。清代科举制度盛极一时。“八股考试”以背诵儒家经典为主，士子应试，多求助于类书。同时封建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斗志，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引向故纸堆中，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使文人学士，寻章摘句，老死翰墨之间。为此清代前期编纂了不少大型类书，如《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子史精华》、《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以《佩文韵府》为例，正集四百四十四卷。拾遗一百十二卷，为张玉书等奉敕编纂，是一部以查找掌故、词藻为主的类书。全书收单字一万，词目六七十万条。如把所列文句典故、引用例句全部计算在内合计不下一百四十万条之多。全书以韵统字，每一

个字之下又分字义、韵藻、对话、摘句四个部分。这是一部供人作文、写诗、填词寻找词藻、凑集对仗使用的类书，亦兼有辞书性质。对于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参考作用。一时流传甚广，其编纂的主要目的，正是为科举制度服务的。

（三）汇集有关资料以供检索

汇集资料，分类排比，以供检索是类书的重要职能。在这一点上说，许多专科性类书的使用价值往往超过一般类书。如专收小说之《太平广记》，专考事物起源和沿革的《事物纪原》、《格致镜原》，专收姓氏之《元和姓纂》、《万姓统谱》、《九史同姓名略》，专收植物之《全芳备祖》、《植物名实图考》，专收古代生产技术资料之《天工开物》等等。都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专门材料。如《全芳备祖》保存了古代农艺及花果草木方面的重要资料；《天工开物》收集了大量古代农业、工业生产技术方面的资料；《格致镜原》汇辑古籍中有关博物、工艺的记载，这些专科类书，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太平广记》辑录了魏晋以迄宋初的小说、异闻、笔记。缪荃孙曾据《广记》校补《北梦琐言》并辑出佚文四卷，然犹有未尽者，可见其在辑佚和校勘方面的价值。鲁迅先生编写《中国小说史略》就曾利用过《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里的材料。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类书保存了大量古代珍贵材料，因而在辑佚和校勘方面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一些大型的类书这一作用尤为显著。鲁迅先生校勘《稽康集》就用过《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的引文，明代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严可均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主要从《艺文类聚》中发掘库藏。清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的《汉学堂丛书》各辑佚书数百种，大都取材于类书。特别是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

乐大典》中辑出古代著作五百余种，其中较著名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旧五代史》等。辑佚和校勘并不是编纂类书时的原有目的和功用，但由于类书以辑存资料为主这一重要特点，它流传至今，客观上起了这样的作用。

综上所述，类书萌芽于两汉，产生于六朝，繁荣于唐宋，大备于明清。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大致的脉络。到了清代乾嘉以后，创编的类书极少，而以翻印旧有类书为多。盖清代后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人侵，中国社会性质起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利用编纂类书宣扬封建教化进行思想统治的老办法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同时随着封建文化的没落和近代科学的发展，类书这一陈旧的体制也已经远远跟不上新兴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代之而起的是百科词典，专科词典、手册、年鉴和百科全书等新型的工具书。不过，对于千百年来留下的类书这一宗文化遗产，今天我们还应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指导思想，研究鉴别，批判利用，从“类书”这一丰富的矿藏中，发掘资料，推陈出新，使之“为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努力”这一宏伟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

重视地方文献的史料价值

范希宏

对于号称文物之邦的江西，多注意收集、保存历代地方文献资料，从而使我省在图书收藏上具有地域特色，值得重视。

最近在古籍普查中，吉安市图书馆发现了一本《瞻岩尺牍》（〔清〕刘绎撰）。乍看这只是一部平常的古籍图书，作为地方文献资料，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具有十分有用的价值。到目前为止，全区仅仅发现了这么一部（残本），更主要的是它的内容。

刘绎为清末状元，江西正三品升军团练。他与曾国藩（当时湖南湘军团练）是同时代，同职位的人，在其往来信札中，多有述及太平天国军作战的军机。此外还有一些地方人文参考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其他地方和书籍中所不易得的第一手资料，它对于近代史的研究，近代战史的研究，都是很有用的。如果把这类资料和湖南省图书馆收藏的曾国藩，曾作荃，左宗棠等人的手札合并研究，那就会发现和得到过去许多未曾发现过的有用的资料。可是，像这样一类史料和普通古籍，由于它距现代的时间较近，往往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如不及时收集很容易散失。又如《庐陵诗存》（清，吉安，胡友梅撰），《吉州人文纪略》（明末清初，赖良鸣撰），《与续吉州人文纪略》（清，欧阳世等撰）以及《丰阳人文纪略》（明，永丰，聂芳声撰）等都记载了大量有关当时的人和事的有价值的资料，要重视地方文献的史料价值。

漫话卷册

——并为出版大部头书者进一言

李长路

什么是卷？什么是册？从历史沿革来讲，一言难尽，不过也能粗略地谈清楚；从今天看来，很简单，大约“卷”是作为一个大的单元来利用的；而叫做“册”或“本”则是依篇幅长短、部头大小来分订成册的。但在装订时，一册书，或上、下二册，或上、中、下三册，背脊不标卷数，翻检起来，读者感到问题不大；可是一遇到大部头书，问题就来了。举中华书局新印本《二十四史》为例（加《清史稿》也可说是“新廿五史”吧），那虽是做了好事；可是美中不足的是，当你要查“某卷”某人的传记时，那就